

SIFL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丛书

中国 重新解释

隐忧与出路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IFL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丛书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中国 重新解释



隐忧与出路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解释中国:隐忧与出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1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丛书)

ISBN 978-7-5426-4315-5

I. ①重… II. ①上…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9569 号

重新解释中国:隐忧与出路

著 者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张向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315-5/F·650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序 言

中国过去 30 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这包括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长期稳定在高速的 GDP 增率、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我们对这一判断没有疑问，那么就就有两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成功？中国未来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构成了近二十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国奇迹”的不同解释。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争论。一方认为“中国奇迹”具有特殊性，主要是源于特殊自然禀赋、转型策略以及政府功能定位的差异化，后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总结为“创新、民生、自主”的“北京共识”。更有极端“中国特殊论”的支持者，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新的观点，认为“党的领导及政府干预”推动了中国奇迹。

另一方认为中国的转型没有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中国经济正是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

同样的事实，不同的解释，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第二个问题，中国未来应该走何种道路，尤其是对政府角色的定位几乎是判若云泥。在国际环境上，前一方人士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不但能够独立于美国之外自行增长，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

提供动力。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人，内嵌于全球化之中，美国衰退时中国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认识，在全球经济形势滑波时，双方对于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也会出现严重分歧。

所以，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解释中国。这就是本书中所要讨论的问题。根据讨论对象的尺度，我们的观察从全局到行业、从长周期到短时段，包括中国体制的基本特征、转型的主要背景、政府特征及房地产市场。这些观察的尺度虽然不同，但对象所指的基本症结却有共通之处，也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近十年工作的主要问题背景，本书的各章节即是其中的部分成果，此前都曾在本院的内部交流刊物《陆家嘴评论》中刊发过。我们认为，要解释中国，就必须把中国放在长周期的尺度来观察，也需要审视基础性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是否特殊的主要参考。

《一万年来谁著史》从历史长周期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化。在追问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经济成就在“大分流”后为何未能延续，不仅被西方超过而且还被拉大了差距。制度至关重要，典型要属在西欧各国陆续开辟通往美洲和亚洲贸易通道的时期，明朝和清朝却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隔绝于15世纪以来世界上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扩张。而为何中国重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同样是制度的转变，包括抓住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开放沿海城市、加入了WTO融入世界市场等。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惊人，但结构性失衡的程度也同样惊人，包括政府与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多种失衡。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信贷方舟：中国模式的一种解读》认为以房地产为代表财富差异，是居民财富分布失衡的关键，核心在于信贷市场配置失灵。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当前由关系型社会结构主导，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信贷，也就更容易先富起来，并且会在这种社会结构

中保持优势地位,这是造成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失衡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今天国有企业持续赢利的主要原因。

《理解中国的经济失衡:中国式分权改革的视角》则着眼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1994年的财政分权改革引发了中国目前经济内部的失衡,要解决经济失衡就必须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分权体制,推动城乡融合,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要素市场以及金融体系,深化对内开放。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财政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互动及其宏观绩效》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一方面财政分权另一方面金融集权的框架中产生的,这看似矛盾,但事实上财政与金融改革之间密不可分。正是因为金融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原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功能,并且金融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财政分权负面效应的配套制度安排,才使得中国经济既保持高速增长同时也使得增长相对平稳。

只有理解了中国基础性的社会结构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客观得审视全球化中的中国转型,城市化是其中最主要的事件。在工业化急剧发展的同时,城市化的速度虽然很快,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重构城市体系:论中国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考察了东部发达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集聚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系。城市化本来是一个能缩减地区贫富差距的过程,因为如果要素在区域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那么除了土地本身之外,其他要素的流动有助于将各地的边际收益率拉到大致相当的水平。但如果要素流动受到限制,尤其是劳动力流动受限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同在一个分权竞争的环境中,欠发达地区就有激励进一步限制资源流动,反而造成了区域发展失衡程度加剧。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在城市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当然,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仅是抑制城市化深化的一部分,城乡居民身份的鸿沟才是中国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身份鸿沟:亟待改变的土地

二元制度》解释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在向城市移动的过程中不仅无法享有城市居民能享受的城市的好处。而且由于其身份限制，在城市扩张进行征地时，农民获得的补偿与其土地随后获得的收益之家的差价要远远大于城市居民。这种身份导致的城乡歧视，也是农村因为征地补偿纠纷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户籍限制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这才有利于稳步推进城市化。

只有完成从土地的城市化到劳动力的城市化，城市化可能真正成为中国向伟大国家转型的助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劳动力遭遇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事件，《刘易斯拐点？：从富士康到中国模式》提出富士康员工跳楼案例表面上是一个企业的劳工保护问题，但折射出的问题却是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是否已经走到头了。在产业转移的国际格局中，劳动力密集和出口导向型企业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在这背后也有着富士康员工辛酸的故事。将这个故事置于城市化的背景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使得中国之前并未受到“刘易斯拐点”的困扰，但劳动力的“价格”已经上升，劳动力供给也呈现出增速趋缓的势头，这将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在未来不能处理好城市化的问题，劳动力达至刘易斯拐点后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基本的社会结构与时代背景之后，政府的角色也是中国转型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四万亿之惑》与《利维坦或比希莫斯：8万亿财政收入的诞生》试图说明的是，中国政府诸多行为的首要目标，往往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以保证其具有能力来控制社会经济活动，让这些活动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在经济面临紧缩时，能拿出政府投资来刺激市场；在社会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有资源来“维稳”。但政府巨额的财政收入究竟从何而来，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都存在疑问。在对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质疑，包括钱从何来、使用中是否导致大规模腐败以及事后政府如何还债等，在今天几乎全部应验。这些疑虑背后折射的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失衡的隐忧，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来获得缓解的话，那么

体制本身的问题,除了推动改革外,可能就没有其他调整的窗口了。

关系型社会、央地财政分权、城市化、财政收入,这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图景。而所有这些,共同产生了一个热门话题:高启的房价。中国大城市的高房价已经被认为是阻碍新一代劳动力在城市定居的重要障碍。如果大城市不能吸引人才,那么城市化进程就会受挫,长期看,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高房价也使得财富分配日趋失衡。所以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分析了城市的房地产问题。

对房产政策的目标而言,一方面房产政策要防止高房价引致的泡沫,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调控之殇:“98 房改”以来的房地产市场》与《房地产调控十年简史》梳理了近十五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指出房产调控政策并未取得理想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以及政府收入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因此陷入了一边要抑制房价一边要维持房价获得政府收入的调控怪圈。并且调控并没有缓解保障房边缘化的事实。调控失灵意味着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定位有偏差,政府应该退出房地产行业的利益格局,逐步放开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从做市商的身份转换为监管者,土地收益应该由消费者和失地农民分享。消除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拉偏架”、“明压房价、暗推房市”的尴尬角色。

《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与变迁(1980—2010)》则具体到住房制度的变迁,审视 1980 年代以来中国住房改革,指出住房市场化使得住房供给大大增加,并且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带动了相关就业,但也造成了住房的差异化程度很大,尤其是在保障房对低收入群体的覆盖方面做得不够理想,将是下一阶段的改革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住房问题并不特殊,东亚、美国的住房市场的历史与中国也有着相似之处。《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住房政策思考:基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以美国住房政策为例,解释了如何避免泡沫和兼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美国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大量居住问题的经验,归结起来,一是解决了资金问题,一是解决了土地供应问题。而中国与美国的房产金融化不

同，因此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使得房屋贷款更易活动，是一个方向；同时应该放开对土地的政府垄断，这有助于极大释放土地市场的潜能；还应该注意的是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带产权的保障房。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道路，有特殊的背景，如发端于农业社会的关系型社会结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但并没有另类的逻辑，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的转型是这些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先天禀赋可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恰是制度转型尚未完成，才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未来的城市化乃至中国模式的出路都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本书的初步尝试既是一个思想的记录，也是希望抛砖引玉，从而有益中国未来的转型。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存在中国模式吗？

一万年来谁著史

——历史长周期视角的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进 管清友 3

信贷方舟

——中国模式的一种解读 高利民 聂日明 37

理解中国的经济失衡

——中国式分权改革的视角 王永钦 75

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互动及其宏观绩效 丁骋骋 傅 勇 98

第二章 如何推进中国城市化？

重构城市体系

——论中国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陆 铭 129

身份鸿沟

——亟待改变的土地二元制度 傅蔚冈 157

刘易斯拐点？

——从富士康到中国模式 聂日明 龚 于 184

第三章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

四万亿之惑	聂日明 龚 于	227
利维坦或比希莫斯？		
——8 万亿财政收入的诞生	聂日明 龚 于	251

第四章 备受责难的房地产

调控之殇		
——“98 房改”以来的房地产市场	龚 于 聂日明	287
房产调控十年简史	聂日明	326
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与变迁(1980—2010)	陈 杰	333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住房政策思考		
——基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	邹永华	360

第一章 存在中国模式吗？

一万年来谁著史

——历史长周期视角的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进

管清友

1843年，大清帝国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遵父命赴京，意气风发，途中写下《入都》诗十首，其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诵。

当时的清帝国，尽管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但已难掩颓势，落日余晖。李鸿章赴京的前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帝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被迫开埠通商，赔款2100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李鸿章决心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组淮军，平洪乱，剿捻匪，兴洋务，办外交，建海军。但甲午战败，声名狼藉；东南互保，做困兽之斗。观有清一代，李鸿章也算功勋卓著之重臣。然而，个人的才识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李鸿章殚精竭力一生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终究也摆脱不了“大清裱糊匠”的命运。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称，“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去世后的这110年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开始逐渐回归到她在世界上曾经的位置。201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接近10%。

2011年是平年，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2011年2月14日，正值中

国农历正月十二，日本公布了 2010 年 GDP 数据，日本 2010 名义 GDP 为 54742 亿美元，比中国少 4044 亿美元，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终结了日本对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长达 42 年的垄断。消息的公布给本已喜庆热闹的春节平添几分喧嚣，海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和看法，感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国内反应倒是颇为平静。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两个月，一些机构已经把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缩短为 5 年。2011 年 4 月 1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 2011 年 4 月版《世界经济展望》，在 WEO 数据库中大胆预测，若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估算，中国经济将于 2016 年超越美国。IMF 预测，到 2016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增加到 18.976 万亿美元，超出同期美国经济规模 0.168 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全球总量的 18%，届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将会萎缩到 17.7%。在下图中，IMF 用数据模拟了中国经济规模是怎样用五年时间从世界第二登上第一宝座。这一预测结果就像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再次触动海外媒体的神经。德国《时代周报》说：人们将见证一场“扣人心弦的世界历史转折”；《华尔街日报》说，“我们正在见证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甚至有外媒把 2016 年称为“中国世纪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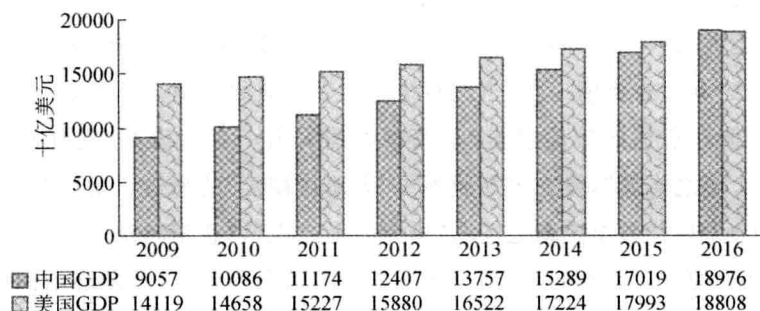


图 1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和美国 GDP 规模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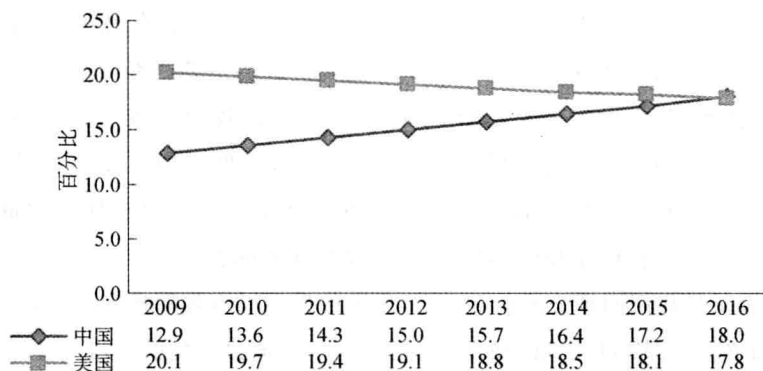


图2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和美国 GDP 占全球份额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 Edition.

国家之间经济总量的较量就好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持续了千年,还在继续。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在持续千年的经济总量马拉松比赛中,中国就好比是骄傲的小兔,领跑了千年便止步停歇,一觉醒来早已今非昔比,被“乌龟们”狠狠地甩在了后面。三十年前开始以加速度奋起直追,以短跑的方式长跑,以冲刺的爆发力提速,追赶上一个参赛选手。现在仅次于美国,重登第一的梦想也是指日可待。

面对中国的复兴,“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言论纷纷粉墨登场,言辞夸张。“捧杀”和“棒杀”的背后中国的真相究竟怎样?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近况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千年的马拉松比赛,中国几经沉浮。我感叹李鸿章之才,也为他的人生际遇悲哀,因此,选用他的《入都》诗句作为本文的题目,希望从一个历史长周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变迁,并展望未来。今天,我们站在过去通往未来的桥梁上,我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历史上的数千年辉煌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与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爱琴

海文明并称人类五大文明。古代中国与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代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是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公元前 16 世纪)。今天,我们很难通过比较经济规模去了解中国在公元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世界中心城市的转移却能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与空间,中心城市的繁荣程度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表 1 带我们回到公元前 2000 年以来的世界城市规模排名,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城市的经济情况,至少也通过聚集的人口反映城市的繁荣程度。这份几经转载获得的资料,可谓是历史跨度最长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排名。放眼望去,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城市映入眼帘。尽管古时候世界的城市数量不多,但是要在全世界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排名三甲,也绝非易事。

从城市规模的排名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城市从公元前 1000 年开始进入前三甲,到 1850 年清朝没落时,北京仍位居榜眼。期间只有两次未有城市上榜,一次是公元前 430 年,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另一次是公元 361 年,匈奴攻占长安结束西晋时代。可以说,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 2850 年,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历史。

从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 1850 年期间,中国榜上有名的城市,不仅是城市的人口规模大,而且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性大都市”。自两汉时期以来,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从长安向东通往朝鲜;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杭州也是历史悠久的贸易港,尤其是宋朝被迫南迁后将新都设在杭州,杭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兴旺。据史料记载,南宋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已达 50 多个,进出口商品已达几十种。自唐、宋以来,广州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根据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刊印的《南海志》中有关市舶的记载,当时与广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已达一百四十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东起菲律宾诸岛,中经印尼诸岛、印度次大陆,直到波斯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地区。